

# 从牧民到农民的心路历程 ——裕固族生态移民过程的心理人类学考察

李 静, 刘继杰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肃南裕固族的生态移民从最初实施到现在已经十年有余, 移民的生计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根据在肃南县双海子村和湖边子村裕固族村民中的调查, 分析移民由“牧民”转向“农民”时内心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总体而言, 裕固族移民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个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基于对裕固族移民心理变化的分析, 提出了促进由“牧民”转为“农民”的生态移民更好适应新生活的建议。

**关键词:** 裕固族; 生态移民; 生计变迁; 心理适应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048-05

肃南裕固族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 长期放牧使当地裕固族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都严重依赖于畜牧业和畜牧产品, 牧民的身份也逐渐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传统的牧业生产正失去赖以发展的空间, 牧业生产的基础被削弱, 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生活在明花区莲花乡的牧民, 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上, 因此, 政府决定将其就近搬迁到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明海乡境内从事农业生产, 并建立了双海子生态移民村。

裕固族生态移民于2000年正式启动, 第一批共78户300名牧民, 他们一改过去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拿起铁锹、锄头, 做起农民。这个由“牧”转“农”的历史性跨越至今已十年有余, 客观生存条件的改变要求其对新环境的适应, 移民的内心世界也经历了由最初的不适应到适应的历程。本文根据笔者于2011年11至12月在迁入地双海子村和迁出地之一的莲花乡湖边子村进行的调查, 梳理裕固族在移民过程中的心理适应过程。被访者以双海子村、湖边子村的裕固族为主体, 涉及同村和周边地区的汉族、藏族和蒙古族, 包括农民、牧民以及部分教师、学生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问卷调查的被访者均为在双海子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裕固族村民。共发放问卷

120份, 收回有效问卷113份, 有效率94.2%。其中, 男性占52.2%, 女性占47.8%; 20-29岁占8.8%, 30-39岁占25.7%, 40-49岁占46%, 50-59岁占14.2%, 60岁以上5.3%。以下分析所用统计数据和访谈资料均来自本次调查。

## 一、移民之初的心理历程

认知活动是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的开端和基础, 人们借助认知得以获取和加工外界信息, 并对周围的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认知活动受外部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制约, 当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 原有的认知结果和生活经验在新的客观现实中可能已经不适用, 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客观存在并建立新的经验。当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时, 这种再认知的过程往往会导致人们的内心世界出现一些难以适应的情况。在移民工程的开始阶段, 面对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绝大多数裕固族移民都无法适应, “痛苦”和“纠结”成为该阶段裕固族移民内心世界的重要感受。

1. “去”与“留”的“挣扎”。双海子裕固族的原居地——莲花乡曾是肃南有名的贫困乡, 当地气候干燥, 多风沙, 少降水。长期以来, 牧民虽不为温饱发愁, 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等因素的制约,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为了促使牧民搬迁,

收稿日期: 2013-01-28

基金项目: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构建适合藏区民族文化特点的草地管理模式”(201203006-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方式变迁及其心理适应研究”(12YJC850011); 北方民族大学科研项目“城市回族流动人口生活方式变迁及其心理适应研究”。

作者简介: 李静, 女, 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E-mail: jingli1212@hotmail.com

政府为计划内移民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因此,向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双海子村移民所具有的拉力是明显的。然而移民初期迁入地的配套设施尚未完善,更重要的是搬迁后他们要放弃世代从事的畜牧业,从事完全陌生的农业,这使多数有搬迁想法的人打起了退堂鼓,面对“搬”与“不搬”的问题犹豫不决,多数人在最初“干脆不愿意搬”。根据对搬迁牧民的调查显示,65.5%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是在犹豫之后才选择搬迁的,有0.9%的被访者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搬迁,毫不犹豫选择搬迁的约占33.6%。

“任何一个自我决定的行动,在其开始之前,都有一个考察和深思熟虑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情境定义’。事实上不仅具体的行动有赖于情境定义,而且整个的生活谋略和个人人格都逐渐遵从一系列这样的情境定义。”<sup>[1]</sup>另外,人的心理活动存在不同的特点,面对客观事物时,其内心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判断和选择,“给两个人以相同的刺激,但他们很有可能对这个刺激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sup>[2]</sup>

有一种说法就是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土窝窝好,当时谁也不愿意走。县里乡里就开始下来动员,然后就说你的草场也有,先去种地适应一下,实在不行想回来就可以回来。(钟某,男,42岁,农民)

我们刚开始来了八十几户(实为78户),有二十几户都受不了回去了。刚来那时候这里啥都没有,就是个沙,风大的很。风刮的饭也吃不上,地里的活又累,就想回去呢。……有些人看着没收入,然后就往老家跑。(安某,女,44岁,商店老板,农民)

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故土的留恋增加了村民们的犹豫,为此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在反复动员之后,部分牧民终于同意搬迁。少量牧民在搬迁之后,已经坚持到将土地开垦好,但仍因为受不了农区的艰苦而选择回到牧区,回去之后因为草场已被重新分配而断绝了生活来源,又重新回到双海子村。牧民们在移民之初的这种不愿搬迁和反复迁移的现象体现了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挣扎,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选择了搬迁,现实情况和理想的差距以及对故乡的眷恋又使他们犹豫不决,此时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处在“挣扎”之中的。

2. 从牧民到农民生计转变的“痛苦”。在迁出

之前,裕固族均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兼营少量农饲生产。迁移到双海子村之后,原有的分散居住模式被集中连片居住模式所代替,传统的游牧生计经营方式在这里行不通,也不被允许,农耕成了他们最初阶段唯一的选择。

我们牧业上有句话,在牧区找不到一把好铁锹,在这个地方(农区)铁锹就是吃饭的家伙。我们这个地方找个好兽医很容易,找个好的种地的,农业上的能手不容易,我的种地技术也一直不行。(钟某,男,45岁,农民)

裕固族长期从事畜牧业,自幼的耳濡目染和实践造就他们对牧业的精通,但他们几乎不接触农耕,农业技能非常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如何耕种土地并不了解,面临着“不会种地”的局面。另外,初期的农田水利、道路交通以及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很多工作都需要移民自己完成,这不仅加大了他们适应的难度,而且增加了他们因生计方式转变而带来的心理上的痛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客观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关联结构,人们依靠在意识中对其作出反应进行思考并开展活动,即“对这个世界的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有关它的各种经验储备基础之上,……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sup>[3]</sup>在现实世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现有的知识”不足以为移民解释社会事实提供足够的“参照图式”,他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事实以储备足够的经验来应对。

如今双海子村的裕固族移民的生活已经有了较大的起色,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都比在牧区改善了很多,本不适应农耕生活的牧民逐渐找到了感觉,76.1%的被访者表示对现有的农耕生活经历了一个由不能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19.5%表示自己从最初就基本能够适应农耕生活,仍有4.4%的被访者认为自己一直无法适应。

3. 从牧民到农民身份认同的“迷茫”。在原有生存环境下,裕固族牧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搬迁之后,那些曾被赋予意义的身份认同符号发生改变甚至消失,草场被农田取代,牲畜变成了庄稼,分散的居住格局转为集中定居等,其中最大的转变莫过于生产活动由畜牧业到农业的转变。这种身份符号的转变对许多牧民来说往往难以接受,他们必须在新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重新赋予其新的意义体系。这个“重新赋予”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会导致一些牧民心中

的迷茫,对原有意义体系(如故土、旧业等)的怀念,则会加重这种迷茫,增加认同新身份的难度。

在传统的裕固族民众心中,放牧和种地是区分裕固族和汉族的重要标志,世代从事的牧业生产是他们作为裕固族身份的象征,其对牧民身份的认同远远超出对新的农民身份的认同。在移民们开始农耕生活之后,除少量一些曾经在牧区经营过农业的人表示“虽然累点,但还能习惯”之外,更多的人发现自己对此很不适应,觉得自己“汉族不是汉族,裕固族不是裕固族”,对新身份难以认同,移民的心理过渡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移民身份认同迷茫的重要原因。在迁入双海子村之后,绝大多数家庭仍饲养有一定的牛、羊、鸡等,集中定居后有限的空间则限制了饲养牲畜的规模,有些家庭不得不放弃饲养牲畜,造成其与牧业的“彻底决裂”,传统身份特征再一次消失。此外,裕固族传统饮食中对畜产品的需求较大,定居点无法饲养足够的牲畜,这方面的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传统饮食习惯无法保障,这是难以接受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短期内的巨大变化导致了裕固族移民原有身份特征消失,原有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认同标准被打破,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被削弱,而新的认同尚未确立,二者之间的断裂使民族心理中出现身份认同困难和迷茫的心理体验,成为移民中必然存在的现象。

## 二、农民时代的心路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逐渐从心理上接受农业,以及由牧民到农民的生计方式和身份转变,适应了现在的生活。然而,“在行动者控制的范围内,所采取的手段一般说来不能被认为是随意挑选的,也不应该被认为完全取决于行动的条件,而是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受一种独立的、明确的选择性因素的影响。”<sup>[4]</sup>移民们适应新的社会情境的过程,受到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他们在这种实际可能的范围和限制条件中通过自己的行动,逐渐将自己的行为取向与客观情境要求的规范和价值相适应。

1. 从“茫然”到“理性”。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知结果直接影响其心理活动并决定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缺乏必要的知识,移民们在双海子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初几年当中,很多人的内心都是茫然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耕种眼前的土地,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些村民对此表现得无所适从。

要说100头羊里面有哪一个羊生病了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庄稼反正都绿着呢,哪个地方缺个什么,还是看不到。一看今天他们(指附近的汉族农民)头水(即浇第一遍水)施的化肥是尿素,我们就跟着施尿素,听说二水上他们施的氨,就统统施上氨,汉族能知道庄稼需要尿素还是需要磷肥,但我们就没办法。(钟某,男,42岁,农民)

地里下了种子什么都种不出来,很多人种上十几亩地都赔着呢,10亩地的棉花才卖了1000块钱。那时候不会种,像种棉花,后来才知道要打药,不让它往高里长。种了三四年后才知道该怎么种。(安某,女,44岁,农民)

农耕知识的匮乏必然会导致产量和收入降低,移民们在初期的损失是巨大的。经过若干年的摸索,他们逐渐积累起一些农业生产知识,种起地来不再手足无措。此外,当地汉族移民和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其中多为经验丰富的农民,裕固族村民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和学习,施肥、选择作物的时候不再盲目跟风,而是在理性思考和选择之后作出决定。

如今的村民在面对“是否愿意回到原居住地”这样的问题时,只有23.9%的被访者选择“愿意”,69.9%的人选择了“不愿意”。究其原因,“在这里都扎下根了,不想回去了。”“老家的草场不好,草质上不去,羊的体格小,质量也上不去。”另外,“老家草场退化、土地盐碱化”现象严重,所以“收入不行。”“各方面都不如这里方便。”“在这住久了,回去再不习惯了。”都是村民们经常提到的。愿意回迁的村民则是因为牧业“要清闲些,没有农区这么累。”“现在搞退牧,国家也有补贴。”“老家那里的空气也好些。”“还是不习惯种地”等。部分50多岁的村民认为从事农业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随着自己年事渐高,“种地就干不动了”,所以“目前这个年龄还是想种地,再过几年还是想放牧”。约6.2%的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更关心怎样在现有条件下让生活过得更好。

人是理性的创造物,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能够在面对诸种选择时进行思考和分析,并且根据理性分析作出选择。移民从最初因为“不习惯”而表现出的茫然与摇摆不定到当前面对种地和放牧时的理性态度,这种由“茫然”到“理性”的转变,是建立在对其接触到的事物充分了解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这反过来也推动了村民们的心理适应过程。

2. 从“被动”到“主动”。社会个体往往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为了一定的目的,在主观意志的指导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之下,作出各种适应社会存在的行为。移民在适应新的生计模式的过程中,其心理上经历了从最初的无法适应与被动接受到积极适应与主动参与的变化。

在移民最初的两年中,因为普遍不会种地,所以在农作物的选择上村民们表现出很大的从众心理,由此导致了当地的农作物在最初几年的相对单一。由于被动的跟着他人选择农作物,自身也缺少相应的种植经验,所以很多移民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大量的投入之后,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产出。诚如当地村民所说“裕固族是一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民族”。在经历了前期短暂的被动适应之后,村民们开始了积极主动的探索,寻求发展道路的最大化。2002年(移民第三年),当地开始尝试订单农业,村民的收入有了较大改观,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部分移民将土地流转,自己专门从事牧业或运输业等,在取得这些收入的同时,土地出租所得的费用也构成其收入。部分村民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以经营副业或外出打工等手段增加收入。正因为村民们积极主动的参与,所以这些移民的生活质量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移民工程对改善民生的效果彰显。

从“被动”到“主动”的适应过程,体现了裕固族的传统文化因外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之后,其民族成员内心世界的变迁。村民们曾因为最初一段时间“不知所措”而感到茫然,而在逐渐接受与适应之后,便开始理性地对待这些新事物,并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种变迁是意识因素在其行动中连续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而言,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识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sup>[9]</sup>,裕固族移民在适应新事物的过程中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意识的支配。

3. 从“断裂”到“重构”。“文化过程是动态的、依赖于语境的。”<sup>[10] 237</sup>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发生语境具有丰富的背景,当语境背景改变时,文化的意义也可能随之改变。移民之后的裕固族,一方面,新的文化因素出现在其社会生活中,传统文化的一些成分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基础,双方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移民因此需要努力适应现有的新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地型塑着当前的文化演进过程,在适应新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对传统知识进行重构。

移民到双海子村的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日趋淡化、民族语言面临发展的困境、传统民俗逐渐丧失等方面。

传统语言流失的现象在整个裕固族当中都比较普遍。近年来,双海子村的村民和其他地区的裕固族一样,逐渐意识到保护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这除了表现在一些场合下自己注意使用裕固语之外,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刻意要求子女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

平时丫头(女儿)在学校的时候不怎么说我们的语言,回来以后我们都让她说裕固话呢,在学校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说裕固话。我的想法就是想让她当个裕固族的语言老师,丫头自己也有那个想法。  
(郭某,男,42岁,农民)

又如在恢复宗教信仰方面,村主任向我们介绍:

因为很多村民反映没有宗教活动的场所,所以村上今年(2011年)筹集资金盖了这个鄂博,请马蹄寺的活佛选址,又去塔尔寺请了佛像和经文回来,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时候举行集体的祭祀,平时村民们想来的时候也可以来。要是以后发展旅游的话这也是个景点。

这种对传统的重构并不是简单的恢复,他们在恢复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加入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成分。

### 三、结语

与移民之前相比,双海子村裕固族社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多向的、系统的社会转型。生计方式从畜牧为主、农耕为辅,转变为农耕为主,畜牧、工商、运输为辅。居住地的民族组成从裕固族占绝对多数,转变为裕固族为主,汉、藏、蒙等民族共同组成,而且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其主体地位日渐削弱。语言从以裕固语为主、汉语方言为辅,转变为以汉语方言为主、裕固语为辅。宗教信仰从藏传佛教、萨满教和祖先崇拜相对淡化,转变为藏传佛教和萨满教信仰更为淡化,仅祖先崇拜仍相对较浓,如此种种。

文化变迁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社会层面来看,文化变迁可能会涉及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生活的修正、废除和重建。从个体层面来看,文化变迁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文化框架得到修正,并且/或者使其他解释框架得到发展。”<sup>[10] 267</sup>所以,上述种种变化导致的新旧文化的相遇会促成移民的民族心理发生变化,如果可以根据

已有的经验对移民加以适当的引导,将会促进其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

首先,保护和利用本土知识。生态移民带来的一系列生计方式的变化使裕固族移民需要经历一个重大的认知重构过程。在此期间移民固有的经验和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认知新环境的基础。一方面,他们往往根据原有的认知图式观察和体验新事物,并以此为依据作出具体的决定。另一方面,本土知识为移民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如一些移民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自己的放牧经验,在新社区因地制宜开展牧业生产,这既提高了其生活水平,也促使其更好的适应移民后的生活。因此,注重对移民本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挖掘其中的有利因素,将传统文化与现实有机的整合,在顺应民族心理需要的范围内引导其发展,促使移民理性面对现实,在积极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重构对民族文化的认知,适应社会的发展。

其次,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切实执行。政府部门制定的制度及其执行力度与移民的心理问题产生有很大的相关性,政府制定的制度越完善,执行的力度越高,移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出现问题的概率就越小,其民族心理产生不适的概率也越小。随着肃南县移民进程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移民政策中的不合理性,如配套设施不完善,早期移民的人均耕地低于后期移民,部分移民在迁出地的牧场得以保留,另一部分则被重新分配给他人,移民后的产业发展模式一度僵硬等。这些问题虽有一部分得到解决,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但多数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引起了相关移民的不满,在生产生活中出现消极的言语和行为,适应现有生活的难度加大。如果政府职能部门能够制定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将其切实的加以执行,势必能够为移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帮助,移民的适应过程也会更加顺畅。

再次,关注移民的跨文化交往。生态移民还造

成这样一个事实,即移民的跨文化接触迅速增加。在迁入双海子村之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增多成为村民中普遍的心理体验,90.3%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和其他民族的接触较在牧区的时候增多。这种跨文化接触不但体现在与外部文化的接触增加,而且包括传统地方性知识出现的新变化,如随着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事物不断地出现在其社会生活中,由于原有的裕固语中没有相应表达方式,因此大量汉语借词,如苞谷、电视机、手机、户口、医院、大学生、社会、法律等不断出现,这既表现了在跨文化交往中,裕固语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也体现古老的裕固语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客观现实对裕固民族文化认同及其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面对自身地方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处理与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要求我们构建一种有效的文化能力模型,既能形成新的认知图式,有效应对这种跨文化交往带来的文化变迁,又不至于使其因文化差异的存在而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

最后,生态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裕固族生态移民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社会整合的过程当中,自然环境、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诸方面综合作用,互相融合。这当中,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整合无疑是需要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两个方面。双海子村不仅有裕固族,也有汉族、蒙古族、藏族等,移民使他们杂居在一起,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交流碰撞,从而他们需要经历逐渐适应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当地通过社区建设,提升公共事务处理的合理性,提高不同成员、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建立起以人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增强了不同民族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维护了社区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因而,如何有效发挥移民系统内部的正能量,促进移民迅速的融入迁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之中,是生态移民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于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49.
- [2] 科塞. 社会学思想名家 [M]. 石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84.
- [3] 舒茨. 社会实在问题 [M]. 惠桂恒,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32-33.
- [4] 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M]. 张明德,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

社, 2003: 50.

- [5]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62.
- [6] 赵志裕, 康莹仪. 文化社会心理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程 萃)